

从语言角度鉴别早期可疑佛经的方法和步骤

方一新, 高列过

(浙江大学 中文系, 浙江 杭州 310028)

摘要: 从比照对象的确立、语言标准的提取两方面, 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, 讨论了早期可疑佛经的鉴别方法和步骤。

关键词: 语言鉴别; 佛经; 翻译年代; 可疑

中图分类号: H039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5124(2012)02-0001-09

近些年来, 随着研究的深入, 在利用汉译佛经尤其是早期佛经之前, 应对译者及翻译年代进行必要的甄别和鉴定, 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, 且已有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。前辈时贤的相关考辨成果, 对正确利用早期汉译佛经极具参考价值。总结现有早期汉译佛经考辨研究的方法、步骤, 可为我们鉴别更多可疑佛经进而准确利用这些佛经提供参考。

一、比照对象的确立

早期可疑佛经的考辨离不开比较, 在可靠的比照语料中确立恰当的比照对象, 考辨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。

史光辉考辨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时, 多以《撰集百缘经》为例,^[1-2]说明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一些语言现象始见于三国译经。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, 把《撰集百缘经》归入三国译经, 作为考辨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比照对象, 不太妥当。^①

(一) 比照语料的选取

如何选取可靠的比照语料? 许理和就如何认定哪些是真正的东汉译经提出的标准, 对选取可靠的佛经语料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。^[3]

1. 佛教经录的利用。恰当利用佛教经录等文献学资料, 对目前大藏经题署的早期译经进行辨别, 确定可靠的译经, 是考辨早期可疑佛经的第一步。

我国的佛教经录非常丰富。吕澂引用的佛教经录就有16种。^[4]但以何种经录作为参考依据, 则应当斟酌。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虽编撰时间较早, 收录颇多, 但考核不精, 伪滥不少, 向为学者诟病。许理和的观点是: “我只相信对古代译经的最权威的记载, 即杰出的目录编撰者、佛教学者道安于公元374年编的《众经目录》, 另外, 在某些情况下也参考了4世纪初支愍度所编目录中的一些记载。”^[5]

《众经目录》后散佚, 其大部分内容保留于南朝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中。因此, 对早期译经的考辨而言, 最为可信的经录是《出三藏记集》。前文所述的国内外学者, 都以此为据对早期译经的篇目进行考订。

但仅仅依据经录确定可靠译经, 尚嫌证据不足。

如《四十二章经》。从经录来看, 《出三藏记集》确已记载: “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(旧录云:《孝明皇帝四十二章》, 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)右一部, 凡一卷。……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, 译写此经。”^[6]但关于此经, 争论迄今。

吕澂: “《四十二章经》不是最初传来的经, 更不是直接的译本, 而是一种经抄(《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》一文)。就内容看, 是抄自《法句经》, 我们对出来的有二十八章, 占全经的三分之二。”“我们认定此经是东晋初抄出的。其理

收稿日期: 2011-12-09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(11AYY004)。

第一作者简介: 方一新(1957-), 男, 浙江黄岩人, 教授, 博士, 主要研究方向: 汉语史。E-mail: fyxin@zju.edu.cn

由:一、此经最初见于东晋成帝时的《支敏度录》,所以它应出在此录之前。二、在惠帝时,道佛争论,王浮著有《老子化胡经》,说佛教是假造诸经,但未提到《四十二章》的名字,可见当时尚无此经,否则王浮决不会目睹这一所谓初传佛典而不加以攻击。因此,此经抄出的年限,最早不能超过《化胡经》,最晚不能晚于《支敏度录》。惠帝末年公元三〇六年,成帝末年为公元三四年,大约就产生于此三十年之间。”吕澂撰有《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》,^②专文论证此经为伪经,可以参看。

对吕先生关于《四十二章经》的论断,肯定有不同的看法。但吕先生这段话提示我们,现存的《四十二章经》从内容和宗教史的角度看,与经录的记载并不一致。可见,经录只是考辨依据之一。

2. 佐证材料。许理和提出了三种佐证材料:“一是译经正文的注释,二是当时或时代很早的序言和版本记录,三是某些经文在中国最早的佛经注解中被引用或提到过,或曾是汉后不久产生的重译本所据的底本。”^[1]在本段的注释中作者提到两种注解:“最早引用或提及汉译佛经的注解有以下两种:一种是 T1694《阴持入经注》(为安世高的 T603《阴持入经》作的注解,作者陈慧),另一种是见于 T225 第一卷的注解。T225《大明度经》的译者已不可考,被误认为支谦所译(参考 Lewis R.Lancaster 的文章《被认作支谦所译的〈大明度经〉》,《华裔学志》第 28 期,1969 年,第 246-257 页)。”

从目前的研究看,佛教类书也是确定可靠佛经篇目的重要依据。

季琴调查了编成于南朝梁天监十五年(公元 516 年)的《经律异相》之后发现:“三国康僧会译的《六度集经》被征引 15 次,元魏慧觉译的《贤愚经》被征引 58 次,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的《杂宝藏经》仅被征引 1 次,却只字未提《撰集百缘经》;倘若《撰集百缘经》确为三国支谦所译,那么像这样一部在内容、篇幅上不亚于《六度集经》、《贤愚经》、《杂宝藏经》的作品,怎么可能会受到僧旻、宝唱等人的如此冷落?”^[680]可见,旧题《撰集百缘经》不宜视作三国支谦译经。

但有时,依靠佛教经录、类书这些文献学资

料,有些佛经篇目的译者也不能确定。如《太子慕魄经》。方一新、高列过调查显示:“佛教经录表明,南朝梁以前,只有题名竺法护所译的《太子慕魄经》,而佛教类书的引文表明,南朝梁以前的《太子慕魄经》,就是题名为安世高所译的《太子慕魄经》。”^[7]可见文献学的证据有时作用也是有限的。

许理和认为:“根据以上两条,可以确认一些‘里程碑式’的译经,这些经文毫无疑问是已知的一些经师翻译的。”^[8]作者提到了安世高译的《安般守意经》和支娄迦谶译的《道行般若经》。

(二) 比照对象的确立

在可靠的比照语料中,根据考辨目标的不同,再进一步确定恰当的比照对象。

考辨早期可疑佛经,着眼一般有二:真正的译者和比较确切的翻译年代。目标不同,确立的比照对象也就不同。

1. 译者考辨。要考辨一部可疑佛经的译者,比照对象一般选择同一译者的其他语料。

周睦修考辨《无量寿经》的译者时,分别把该经与竺法护、佛陀跋陀罗、宝云的译经相比,最后确认该经当为竺法护所译,而非后二者。^[8]

有关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考辨,季琴、^[69-11]陈祥明^[12]等均把该经与支谦其他译经进行比较,断定该经不是支谦所译。

2. 翻译年代考辨。考辨可疑佛经的翻译年代,比照对象一般选择同时代的其他译经。

有关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《分别功德论》的考辨,方一新、^[13-14]方一新和高列过、^[15-16]史光辉^[1-2]等学者多选取东汉的可靠佛经与其对比,以说明其不是东汉译经。

确立了比照对象,许理和认为:“(4)用这些‘里程碑式’的译经来进行术语和风格的分析,以便明确各个译经团体在词汇和风格上一些各自的特征。(5)根据第四点,再对现存译经中道安和支愍度定为汉代译作的其他经文作考查,结果,有两部应该排除。”^[9]也就是说,汉译佛经的考辨最终还是要以对经文本身的考察为参照点。

二、语言标准的提取

在考辨早期佛经中,东晋道安等已经注意利用译经的文体、格式以及译语,例如:“又《首楞严三昧经注序》终^③记载之僧祐法师之子注中

转载原道安录之记文云：

安公经录云：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，支谡所出，其经首略‘如是我闻’，唯称‘佛在王舍城灵鸟顶山中’。由此可知，道安所见之此经本有中平二年翻译之识语，经之起首无‘如是我闻’句，直以‘佛在王金^④城’云云之文为始。”^⑤

遇笑容、曹广顺指出：“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不同时期的语言，在语法、词汇上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特色。同样，在同时期之内，不同的作者对语言的使用，也会有所不同。通过考查作品的语言，来判定作品的时代和作者，不仅是可行的，而且较单纯依赖文献记载更为科学、可靠。”^{①77}曹广顺、遇笑容认为：“作为一种历史文献，每一种译经都应该在语言上有其特征，反映某一时代、作者的语言习惯。因此，我们有可能根据语言特征来研究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。”^{①81}

随着汉译佛经语言研究的深入，目前学界对某些佛经的语言特征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，从语言角度对可疑佛经进行考辨，对明确可疑佛经的翻译年代、译者都是大有帮助的。早期多从词语的角度考察，后来，语法特点也成为重要标准。

（一）词汇标准

以词汇为标准对早期可疑佛经进行考辨，学者们多从译名（含音译词、意译词）、普通词语、常用词、俗语及固定格式等角度进行考辨。

1. 译名（含音译词、意译词）。从佛经翻译史看，早期佛经译名具有明显的个人特点和时代特点，可为译者和翻译时代的判定提供证据。许理和指出：^{①948}“对于中国佛教初期历史而言，翻译所选的文本的性质以及翻译所用的术语，均揭示了汉代佛教的某种基本特征。”^⑥吕澂认为^{②01}《五阴譬喻经》《转法轮经》《法受尘经》《禅行法想经》不能确定为安世高所译，就是从“翻译用语”的角度出发的。^⑦小野玄妙^{②119-20}认为《四十二章经》从序文至正文均是伪作，“其证据可求诸文中使用之译语，例如辟支佛、阿那含等，此均为僧祐法师所谓新经之用语，亦即是笔者于本书所云旧译时代之译语，……《四十二章经》非写于明帝代，经典本身即可提出充分证明。”许理和^{③1}《五阴譬喻经》和《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》时，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“术语”。^⑧

在考辨早期可疑佛经的论文中，佛经译名常

常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。下面以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《旧杂譬喻经》的辨考为例作一说明。

首先看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。

林显庭指出，^{②21}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一些佛经译名，“显为东晋末鸠摩罗什来华主持译经后，始为佛学界普遍沿用者”，作者列举的词目如下：

梵文“anuttara samvaksambodhi”，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译作“阿耨多罗·三藐三菩提”，而鸠摩罗什之前大多译作“怛萨阿竭阿罗诃·三耶三佛”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”，三国支谦译作“无上正真之道”，至鸠摩罗什方才译作“阿耨多罗·三藐三菩提”。

梵文“Gandharva”，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译作“乾闥婆”，而东汉译经多作“乾沓和”或“捷沓和”，鸠摩罗什译经改作“乾闥婆”。

史光辉^{①-21}指出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有8个佛经译名，东汉译经并未使用。分别如下：

三国译经始见之译名：摩睺罗伽，东汉译经只用“摩休勒”、“摩睺勒”；夜叉，东汉译经作“闾叉”；涅槃，东汉译经用“泥洹”、“般泥洹”；南无，东汉译经有1例“和南”，如是我闻，东汉译经用“闻如是”；耆婆，东汉译经未见。

另外，“憍陈如”，东晋始见，东汉三国西晋译经作“阿若拘邻”、“拘邻”；“紧那罗”，东汉用“真陀罗”、“甄陀罗”、“甄多罗”。

上述佛经译名的考察，为断定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非东汉译经提供了重要证据。

再看《旧杂譬喻经》。

梁晓虹^{②31}考察了三国吴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和旧题吴康僧会译《旧杂譬喻经》两部经佛教专有名词使用的异同：（1）太（泰）山（地狱）：这是《六度集经》常用的专有名词，共出现近四十次，指众生六道轮回中的“地狱”；而在《旧杂譬喻经》中，却未见一例，径直意译为“地狱”或音译为“泥犁”。（2）四果：《六度集经》习惯把须陀洹果意译为“沟港”，斯陀含果意译为“频来”，而《旧杂譬喻经》对“四果”只用音译。

（3）佛的称呼：《六度集经》喜欢在称“佛”的同时，间也插称“众佑”，为梵文的旧意译词；西晋以后，新译为“世尊”；《旧杂譬喻经》则一律称“佛”。（4）除僮：《六度集经》多见。而《旧

杂譬喻经》则均用音译“比丘”。(5)缘觉:康僧会常说成“缘一觉”;“阿罗汉”,又常常音译为“应仪”、“应真”,这些均不见于《旧杂譬喻经》。

《六度集经》与《旧杂譬喻经》佛教专有名词使用差别如此明显,可见不是同一译者所译。

2. 普通词语。普通词语数量巨大,随着社会的发展,其更新、变化也比较明显。下面以《无量寿经》《阿难问事佛吉凶经》的考辨为例作一说明。

周睦修(释德安)指出,^[8]“功作”、“国邑”、“劳苦”、“圣旨”、“姿色”、“寿终”、“游履”、“消化”、“寻”、“底极”、“咨嗟”等词的使用情况,《无量寿经》与竺法护译经相似,而与佛陀跋陀罗、宝云二者的译经有明显的差别,可见《无量寿经》应当是竺法护所译。

方一新、高列过指出,^[24]旧题东汉安世高译《阿难问事佛吉凶经》中的9条词语,可靠的东汉译经都没有用例。如:“仁圣”、“谐偶”、“怨讼”,三国以后译经始见;“康强”、“清高”,魏晋以降方有用例;“阿枉”、“正律”,西晋以后译经始见;“逼促”,东晋以后译经有用例;“估贩”,北魏译经始见。这些词语的运用说明,《阿难问事佛吉凶经》不是东汉译经,当然更不可能是安世高译经。

3. 常用词。汪维辉认为:^{[25][12-13]}“常用词使用频率高,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头和笔下,很难作伪,是从语言角度判定作品时代的一个可靠根据。早期汉译佛经中有许多译人不明的‘失译’经,我们在研究中发现,从常用词的角度去推定这些经的实际翻译时代是一条有效的途径(当然还要结合其他证据)。”学者从这个角度对《侏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》《兴起行经》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《菩萨本缘经》《撰集百缘经》进行了考辨。^⑨以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考辨为例。

陈祥明^[12]考辨《撰集百缘经》时,所列语言证据包括“寻/觅”和“呼/唤”两组常用词,作者认为:“我们推测《百缘经》不是支谦译经,其译出年代很可能不早于东晋。”

4. 俗语及固定形式。俗语及固定形式字句简练,通俗形象,也可以成为佛经考辨的证据之一。

林显庭^[22]认为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不是东汉

译经,就运用了此类证据:“后汉译经,于大众凝目瞻视世尊处,有译作‘努目看世尊’者,虽合经文原意而病在太质;鸠摩罗什译经时,修改之为‘瞻仰如来,目不暂舍’或‘瞻仰尊颜,目不暂舍’,以求信雅兼顾。今按:《大方便佛报恩经·论议品》中即作‘瞻仰如来,目不暂舍’。”

汪维辉^[26]认为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非东汉支娄迦谶所译时,也运用了此类证据,举一例如下:“一卷本用‘助欢喜’,……支谶译经只用‘助欢欣’,仅见于《道》,……在支谶译经中,‘欢欣’仅见于《道》,^⑩而未见于他经。《道》也用‘欢喜’,但不跟‘助’连用,……就‘助欢喜:助欢欣’这一组合而言,一卷本和支谶译经分用划然。”

方一新、高列过^[7]也列举了《太子慕魄经》中“两目并青”、“乃如是也”、“求死不得,欲生不得”等,其可靠用例均不见于东汉译经,可见旧题安世高译的《太子慕魄经》不是东汉译经。

(二) 语法标准

与词汇相比,语法的变化相对缓慢,比较稳定,系统性比较强,更能显示出时代特点、作者或译者的个人特色。在考辨早期可疑佛经时,语法标准也被广泛使用。

1. 句法。判断句、被动式、疑问句、动补结构、处置式等,常被作为辨伪的句法标准,另外,固定句式也被学者使用。

(1) 判断句。“是”字型判断句是东汉以来发展成熟的新兴句法现象。有关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、《撰集百缘经》、《菩萨本缘经》考辨的论文,都把判断句作为重要的句法标准之一。

如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。史光辉指出:^[1-2]该经出现的助动词修饰判断词“是”,东汉译经未见,三国以后,此用法渐渐兴起;“今……是”这一句式是三国以后译经的常见句式,而东汉译经则用“今……是也”。方一新指出:^[13]该经“是”字判断句的否定形式“非是”的出现次数和三国两晋时期的译经相近。

季琴、^[6]陈祥明^[12,27]等也把判断句作为标准之一,对《撰集百缘经》、《菩萨本缘经》的译者和翻译年代进行了考辨。

(2) 被动式。汉语被动式类型多,历时变化明显。中古汉语的被动式很有特点,许多佛经

考辨文章都以此为鉴别标准之一。

曹广顺、遇笑容^[18]从“被”字句、“为(见)”字句的出现频率,所占比例和“被”字后是否出现施动者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,指出《旧杂譬喻经》所处的时代大致在三国前后。颜洽茂、熊娟、^[28]陈祥明^[27]都指出:《菩萨本缘经》与支谦译经被动式面貌差别明显,认为该经不是支谦的译经。另外,方一新、^[13-14]方一新和高列过^[15]对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《兴起行经》《分别功德论》的考辨也把被动式作为句法标准之一。

(3) 疑问句。中古汉语时期,疑问句产生了许多新的形式,时代特色鲜明,很多文章都以此为考辨的句法标准。这里以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考辨为例作些介绍。^①

季琴^[6]指出:带“不审”疑问句,东汉《中本起经》有用例,支谦译经及其他三国译经没有,但《撰集百缘经》有9处;季琴指出:^[6, 11]从《撰集百缘经》“颇 VP 不”式反复问句的用例情况来看,该经更接近于南北朝译经。

陈祥明^[12]比较了《撰集百缘经》与支谦18部译经,指出在“颇(叵)、岂、宁”作疑问副词的疑问句的使用上,《撰集百缘经》只用中古新兴的“颇”,不用“岂”、“宁”;而支谦译经恰好相反;同时,《撰集百缘经》与支谦译经的选择问句在关联词方面不同:前者“为、为是、为当”三者并用,后者只用“为”。目前的研究表明,“为是”“为当”作选择问句的关联词语分别不早于西晋和东晋,可见《撰集百缘经》的翻译年代不早于西晋。

除判断句、被动句、疑问句外,动词连用格式、动补结构、处置式、存在句等,也被作为句法标准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^②

(4) 固定句式。固定句式的形成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,对考辨佛经的年代也很有帮助。这里以对旧题东汉安世高译《太子慕魄经》的考辨为例作些说明。^③

方一新、高列过指出,^[7]该经有些固定句式,见于三国、西晋以后的文献。如:“~怪所以”,译者或年代明确的较早书证当为三国、西晋的用例;“V 着一面”,西晋以后译经常见;“了不复”,佛典中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西晋佛经;“未+动词+顷”(“顷”表示时段),见于西晋以后的文

献;“动词+取+宾语”(“取”没有实义),见于三国以来的典籍。

从这些固定句式看,这部《太子慕魄经》应该不是东汉译经。

2. 词法。在词法标准中,虚词非常常见,另外还有构词法等。

(1) 动词。遇笑容、曹广顺^[17]考察了《六度集经》《旧杂譬喻经》《撰集百缘经》的完成动词,发现《撰集百缘经》《旧杂譬喻经》中“已”均占很大优势;《六度集经》中“已/竟”合起来,也有明显优势,但仍有从“迄/毕”向“已/竟”过渡的痕迹。可见《旧杂譬喻经》与《六度集经》可能不是同一译者。

(2) 副词。以副词为考辨标准时,学者们分别从新兴副词、副词的使用频率、副词的历时更替等角度进行论证。下面各举一二例。

新兴副词。如“定是”,方一新指出^[29]乃三国以后出现的新兴副词;又如“甚用”,^④方一新、高列过指出,^[7]这是一个西晋以后出现的新兴副词。

副词的使用频率。梁晓虹^[23]指出《六度集经》和《旧杂譬喻经》作状语的程度副词“大”的使用频率不同:《旧杂譬喻经》中“大”较为多见;类似的用法《六度集经》也有,但并不多见。遇笑容、曹广顺^[17]调查发现,《六度集经》总括副词“都”的使用频率相差很大。据此可以推断,这两部经可能不是同一译者。

副词的历时更替。季琴指出:^[6, 11]在可靠的支谦译经里“稍”仍然占优势,然而在《撰集百缘经》里“稍”却销声匿迹,单音节副词“渐”独用多达44次,并且双音节副词“渐次”在《撰集百缘经》里出现了11次。可见,《撰集百缘经》很可能不是支谦所译。

(3) 代词。中古时期,汉语的代词系统面貌发生了很多变化,这为考辨早期可疑佛经提供了很好的鉴定标准。目前的考辨文章,特指疑问代词作鉴定标准的比较多。

1) 特指疑问代词。以特指疑问代词为考辨标准时,学者们分别从新兴词语、使用频率、用法、历时更替等角度进行论证。下面各举一二例。

新兴特指疑问代词。如:在考辨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时,方一新、^[13]方一新和高列过^[16]指

出,该经中“何因缘故”、“以/因何事故”、“何处”、“何事”等,可靠的东汉译经没有用例。考辨《佛说榕女祇域因缘经》时,方一新^[29]指出,该经的时间疑问代词“何当”、“久近”,东汉佛经未见。

疑问代词的使用频率。方一新、高列过考辨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时,指出:^[16]东汉佛经使用不多的“云何”在该经中广泛使用;东汉佛经频繁使用的“何等”,该经使用很少;东汉佛经中比较活跃的“何所”,在该经中呈现萎缩之势;“何”在东汉佛经中的使用频率比该经高。该经这几个疑问代词的使用面貌更接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。

疑问代词的用法。方一新、高列过指出:^[16]“何因缘”与表示事物疑问的“何所”二者的用法,东汉佛经与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差别很大:东汉佛经“何因缘”用于原因疑问句41次,34例作状语,1次作动词宾语,5次作介词“从”的宾语,1次单独使用;而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中,“何因缘”也用于原因疑问句,有10例,但有9例都是作介词“以”的后置宾语。东汉佛经表示事物疑问的“何所”,作宾语2例,1例作动词后置宾语,1例作动词前置宾语;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事物疑问句运用“何所”的12例,11例作动词前置宾语。其中“何所作为”7例,“何所归依”4例,作介词“为”的前置宾语1例。

疑问代词的替换。陈祥明^[12]指出:支谦译经“所以者何”全部用来询问原因,而《撰集百缘经》未见“所以者何”,主要用“何因缘”、“何缘”、“何故”来询问原因。卢巧琴指出:^[30]安世高译经常用“何以故”询问原因,而《五阴譬喻经》却用“所以者何”。

2) 人称代词。学者多以同一指称下不同代词使用频率的差异作为鉴别标准。

如第一人称代词。胡敕瑞指出:^[31]安世高译经中第一人称代词几乎都用“我”(共162例),只有两例“吾”,而这例外的两例正出现在《法受尘经》中,这可以作为证明《法受尘经》不是安世高所出的证据之一。

第二人称代词。汪维辉指出:^[26]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第二人称代词用“汝”(共13见,其

中“汝等”3见);而支谶译《道行般若经》一般用“汝”,但也用“若”。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不用“若”,与支谶不合。

3) 人称代词的复数表达。史光辉指出:^[32]支谶译经常用“是曹、我曹、卿曹、若曹、曹辈、曹等辈、曹等”等来表达多数;而《侏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》中不见“曹”,只用“等”,这与支谶译经很不相同。

(4) 句尾语气助词。以句尾语气助词作为鉴别标准,学者大多从两个方面切入考察:疑问句语气助词、语气助词的句型分布。

疑问句语气助词。方一新、高列过指出^[15]《分别功德论》与东汉译经疑问语气助词在使用频率、种类及分布比例、新兴疑问语气助词“那”的使用等方面情况迥异,据此可以判断该经不是东汉译经。颜洽茂、熊娟^[28]对支谦一些可靠译经中用于特指问句和是非问句的疑问语气词“耶”和“乎”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,发现《菩萨本缘经》“耶”和“乎”的使用频率(50:8)不仅与支谦译经(65:112)很不相同,而且与其他三国时期译经也不同。可见《菩萨本缘经》不像是支谦译经,也不是三国译经。

语气助词的句型分布。汪维辉^[26]对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和支谶所译《道行般若经》中的“耶”、“乎”、“也”三个句尾语气词作了调查统计,如表:

	耶		乎		也	
	选择问句	一般问句	选择问句	一般问句	陈述句	疑问句
一卷本	0	0	0	3	11	4
《道》	6	25	6	26	111	0

作者进而对表格进行了说明分析:

第一,支谶多用“耶”,《道行般若经》中就有31例,有两种用法:用于选择问句,与“乎”搭配使用;用于一般疑问句。而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表示疑问语气不用“耶”,而是用“乎”和“也”。第二,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“乎”都用于一般疑问句,而《道行般若经》中,“乎”用于一般疑问句和选择问句。第三,《道行般若经》“也”全部用于陈述句,而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“也”用于陈述句和疑问句。

另外,助动词、介词、连词、量词、个案虚

词等，也有学者用作鉴别标准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¹⁵

(5) 构词法。方一新指出，¹³¹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“~切”式词语，多见于魏晋以后的典籍，可见该经不是东汉译经；周睦修¹⁸考察了《无量寿经》中的若干AA式、AABB式、双动宾结构的词语，指出该经应该是西晋竺法护所译。

附带说明的是，张诒三¹³³从词语搭配的角度进行了考察，认为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不是东汉译经。¹⁶

(三) 行文风格

时代不同，译者不同，汉译佛经的行文风格也不尽相同。因此，对可疑佛经的行文风格进行考察，也成为考辨佛经的语言学手段之一。学者多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。

1. 开头语。周睦修指出：¹⁸“《无量寿经》序分包含了竺法护译经常用的‘一切大圣’、‘神通’、‘总持’、‘辩才’等词，这几个用词在语序上也与竺法护的译经语序一致。《无量寿经》出现特殊规格的开场套语，是‘竺法护译经团队’才有的语言特征。”据此可知《无量寿经》当是竺法护所译。

胡敕瑞¹³¹以首句的差异作为鉴别《法受尘经》非安世高所译的证据之一：“安世高译经首句多是‘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’，而此经首句是‘闻如是，一时佛游于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’。”

方一新、高列过调查发现，¹³⁴《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》“闻如是：一时佛至罗阅祇耆闍崛山中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”这样的开头，是东汉后期支娄迦谶以来才开始使用的句式，安世高译经尚未见到。可见该经不当视作安世高译经。

颜洽茂、熊娟¹²⁸指出：在可靠的支谦译经中，有20部译经首句都是“闻如是，一时佛在（遊）……”，其他三部佛经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菩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《了本生死经》的开场直接以“佛”开头，而《菩萨本缘经》的开场语则与此都不同，第一句往往是“我昔曾闻”、“如我曾闻”（第三品为“如我昔曾闻”）；第二句往往是“过去有王……”、“菩萨往昔（往

世）”等，可见把《菩萨本缘经》视作支谦译经是有问题的。

2. 结束语。出本充代考察了《撰集百缘经》和《贤愚经》的结束语：“《撰集百缘经》中，每个故事结束时，一般用如下定型句（一百话中九十八话用了这一句）：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而《撰集百缘经》第九八话《恒伽达缘》用的是如下表现：佛说此已，诸在会者信敬欢喜，顶戴奉行。（255a14）这一说法也抄袭了《贤愚经》《恒伽达品》中的如下表现：佛说此已，诸在会者信敬欢喜，顶受奉行。（356a11）”¹⁷出本充代博士把这一点作为《撰集百缘经》抄译自《贤愚经》的证据之一。

方一新、高列过指出，¹³⁴《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》的结束语与安世高译经差异明显，表现为三点：第一，安译佛经都说“佛说是”、“佛说如是”、“佛说是已”等，不说“佛说是经”。第二，安译佛经受众比较简单，通常是个人（如“阿难”）、比丘、诸菩萨等，也经常统称“皆”；不像此经把“舍利弗罗汉、文殊师利菩萨、诸天人间人民、龙鬼神”悉数列出。第三，末尾语，安译佛经通常是“受行”、“皆欢喜”、“皆欢喜受（行）”、“皆大欢喜”等，不似此经云“一切欢喜，作礼而去”。因此可以判断该经非安世高所译。

3. 句子格式。就笔者所见，俞理明以四言格句式为依据，对《四十二章》进行过考辨，指出：“四字格约占全部句数的一半，用字数占百分之四十五，超过居第二位的五言句一倍以上。四言句本是汉语常见的文句，用例较多，但《四十二章经》中的这个比率，还是偏高的。具体到各章节来看，约三分之一的章节符合四言格文体标准；近半数的章节四言句不足全部句数的三分之一，其中不少章节是靠非四言的排比句来保持句式的整齐的。……从文体特征来考虑，汉末译经四言格的产生，使得抄经人能够从部份以四言格写成的经文中抄录经文，《四十二章经》的出现，当然也在汉末或者更晚些时候。旧说认为《四十二章经》是最早的汉文佛经，但在支曜《成具光明定意经》以前，译师们没有连用多个四言句的习惯，经文中的排比句也很少用，草创期译师们在为克服辞不达意而努力的时候，是无暇顾及

词句的雕琢的。……《四十二章经》是汉末以后产生的,它不可能是最早的汉译佛经,它的来源也可能不只是一种经文,当然也有可能包括最早译出的汉文佛经。”^{[35]25-29}

4. 特定场合的套语。(1) 对话形式。周睦修指出:^[8]“当《无量寿经》的译者使用‘对曰’时,是用于下辈回答上辈的场合,全经6处没有例外。提问人所问的内容,多用在‘要求证实’的问句上,所问的多与‘是否见闻’有关,且答话人的回答简洁,很多时候仅用二字或四字来答复。”竺法护译经“无论是从语境或用法来看,都呈现出一种固定的对话形式或内容,与《无量寿经》相当”,“从与‘对曰’有关的对话形式来看,《无量寿经》与竺法护译经在使用场合上的类型颇为一致,佛陀跋陀罗、宝云却见不到类似用法,据此分析《无量寿经》应为竺法护所译。”

(2) 出场套语。出本充代指出:《撰集百缘经》第九八话《恒伽达缘》和《贤愚经》第六话《恒伽达品》中的语词更为一致。《撰集百缘经》的其它故事中,表现主人公出家场面时,一般用如下定型句:

善来比丘。须发自落,法服著身,便成沙门,精勤修习,得阿罗汉果、三明、六通,具八解脱。诸天、世人所见敬仰。

而在《撰集百缘经》第九八话《恒伽达缘》中,如下描写同一场面:

于时,如来听为沙门。法服在体,使(v.l. 便)为比丘。佛为说法,心开意解,得阿罗汉果、三明、六通,具八解脱。(254c7f.)

这一说法显然沿袭了《贤愚经》第六话《恒伽达品》中的如下表现:

于时,如来听为沙门。法衣在体,便成比丘。佛为说法,心意开畅,成罗汉道、三明、六通,具八解脱。(355c11f.)

出本充代博士也把这一点作为《撰集百缘经》抄译自《贤愚经》的证据之一。

最后还要说明的是,梁晓虹^[23]还从文体的角度对《旧杂譬喻经》作了考辨:“总的说来,《六度集经》所译时代较早,加之译者康僧会的汉语水平又比较高,所以译文典雅流畅,读起来文言气息比较浓;而后者因时代较后,故白话味道较足。”

近年来,从梵汉对勘的角度对可疑佛经进行考辨,也有学者尝试,如出本充代博士等。笔者所见有限,姑且从略。

方一新指出:^[13]“通过语法、词汇的某些用法来鉴定佛经的翻译年代,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。比如,东汉和三国、西晋的时代较近,有些语言现象未必就能一刀两断,区分得一清二楚。又如,如何选择鉴别的标准,提取作鉴别用的有价值的区别性语言特征,也是十分棘手的事,鉴别标准提取得不准确,则结论可想而知。再如,古书浩如烟海,个人所见有限,说某种语言现象只见于某一时代或始见于何人何书,也很难说。”总体来看,从语言角度对早期可疑佛经进行考辨,词汇、语法均是有效的手段,但怎样利用这种手段,使考辨的结论更有价值,确实还需要进一步探索。

注释:

- ① 《撰集百缘经》已有一批学者作过考辨,认为不是可靠的三国译经,相关考辨成果详见下文。
- ② 参见吕澂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中华书局,1979年,276页。
- ③ 终,当是“中”之误。
- ④ 金,当作“舍”。
- ⑤ 见【日本】小野玄妙(1983:26)。
- ⑥ 见许里和(1998:48)。按:许里和,即许理和。
- ⑦ 吕澂(1980:3)认为:“从翻译用语等对勘,《五阴譬喻经》、《转法轮经》、《法受生经》、《禅行法想经》四部是否世高所译,尚有问题。”
- ⑧ 许理和(2001:309)《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》认为《五阴譬喻经》“无疑是早期译经,但是它的风格和术语绝对不同于安世高及其译经团体的译文”;《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》“从风格和术语来看,它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汉代译经,尽管我们还不肯肯定它就是支娄迦讫所译”。
- ⑨ 关于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,史光辉(2001、2009)考察了“侧/边”、“牧/放”等;胡救瑞(2005)考察了“求、索/觅”、“呼/唤”、“见/看”等;关于《撰集百缘经》,季琴(2004)、(2006)考察了“看/视”、“牧/放”以及“脚”等;陈祥明(2009)考察了“寻/觅”、“呼/唤”等;另外,方一新(2003)考察了“疼/痛”;史光辉(2005)考察了“求/索”;陈祥明(2010)考察了“寻/觅”、“呼/唤”。
- ⑩ 《道》,乃《道行般若经》的简称。
- ⑪ 此类论文还有:陈祥明(2010),方一新(2003)(2008),方一新,高列过(2003)(2008),高列过(2009《东汉佛经疑问代词“何等”“何”地位演变差异探究》,《浙江教育学院学报》第6期),汪维辉(2007),史光辉(2001),周睦修(释德安)(2005)。
- ⑫ 以动词连用格式为考辨标准的文章有:曹广顺,遇笑容(2000);季琴(2004)(2009);遇笑容,曹广顺(1998)。以动补结构为考辨标准的文章有:方一新(2003)。以处置式为考辨标准的文

- 章有：曹广顺，遇笑容（2000）。另外，王建军（2003《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305页）从存在句和行为动词句的角度对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做过考辨。
- ⑬ 考辨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文章以独词句“非也”为鉴定标准的有：史光辉（2001），方一新（2001《〈大方便佛报恩经〉语汇研究》，《浙江大学学报》人文社会科学版，第5期）（2003）；考辨《佛说楞女祇域因缘经》的文章，以“不减于”、“既……且……”、“初不/初无”、“了不可”等为鉴定标准，见方一新（2008）；考辨《阿难问事佛吉凶经》的文章，把“且……且……”作为鉴定标准，见方一新、高列过（2008）。
- ⑭ “甚用”用在情感动词前，表示“非常”之义。但对于“甚用”的结构，季琴认为乃副词“甚”与介词“用”连文而成，见季琴（2004/2009）。时良兵（2004《支谦译经副词研究》，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）认为“用”有词尾倾向。
- ⑮ 以助动词和量词为考辨标准的有：陈祥明（2010）。以介词为考辨标准的有：季琴（2004）（2009）。以连词为考辨标准的有：胡敕瑞（2005），方一新（2008）。以个案虚词为考辨标准的有：周睦修（2005）。
- ⑯ 张诒三（2005：311—313）指出：“饮”与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搭配使用，是在三国至南北朝的齐梁时代；而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中有三例“饮气”，意思是忍气吞声，“气”是“气愤”，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。可见，该经的翻译年代不会早于三国。
- ⑰ 辛岛静志《〈撰集百缘经〉的译出年代考证———以本充代博士的研究简介》，《汉语史学报》第六辑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6。
- 报恩经》为例[J]. 古汉语研究，2003（3）：77-83.
- [14] 方一新. 《兴起行经》翻译年代初探[C]//中国语言学会《中国语言学》编委会. 中国语言学：第十一期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3.
- [15] 方一新，高列过.《分别功德论》翻译年代初探[J]. 浙江大学学报：人文社会科学版，2003（5）：92-99.
- [16] 方一新，高列过. 从疑问句看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翻译年代[J]. 语言研究，2005（3）：54-57.
- [17] 遇笑容，曹广顺. 也从语言上看《六度集经》与《旧杂譬喻经》的译者问题[J]. 古汉语研究，1998（2）：4-7.
- [18] 曹广顺，遇笑容. 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——以《旧杂譬喻经》为例[C]//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. 汉语史研究集刊：第三辑.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0.
- [19] 许里和. 佛教征服中国[M]. 李四龙，裴勇，译. 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98.
- [20] 吕澂. 《安世高》、《支婁迦讖》条[C]//中国佛教协会. 中国佛教：第二辑. 北京：知识出版社，1980.
- [21] 小野玄妙. 佛教经典总论[M]. 杨白衣，译. 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3.
- [22] 林显庭. 大方便佛报恩经纂考及其唐代变文[J]. 中国文化月刊，1987（91）：65-91.
- [23] 梁晓虹. 从语言上判断《旧杂譬喻经》非康僧会所译[J]. 中国语文通讯，1996（40）：62-68.
- [24] 方一新，高列过. 旧题东汉安世高译《阿难问事佛吉凶经》考辨[C]//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：第十辑. 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.
- [25] 汪维辉. 东汉—隋常用词演变研究[M]. 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.
- [26] 汪维辉. 从语言角度论一卷本《般舟三昧经》非支讖所译[C]//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《语言学论丛》编委会. 语言学论丛：第三十五辑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7.
- [27] 陈祥明. 从语言角度看《菩萨本缘经》的译者及翻译年代[J]. 长江学术，2010（2）：152-160.
- [28] 颜洽茂，熊娟. 《菩萨本缘经》撰集者和译者之考 [J]. 浙江大学学报：人文社会科学版，2010（1）：56-64.
- [29] 方一新. 《佛说楞女祇域因缘经》翻译年代考辨[C]//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. 汉语史学报：第七辑. 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8.
- [30] 卢巧琴.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整理研究[D]. 杭州：浙江大学，2009.
- [31] 胡敕瑞. 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[C]//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. 汉语史学报：第五辑. 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5.
- [32] 史光辉. 从语言角度判定《他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》非支讖所译[C]//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. 汉语史学报：第五辑. 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5.
- [33] 张诒三. 词语搭配变化研究[M]. 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05.
- [34] 方一新，高列过. 题安世高译《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》考辨[C]//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. 汉语史研究集刊：第十辑.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7.
- [35] 俞理明. 佛经文献语言[M].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3.

参考文献

- [1] 史光辉. 东汉佛经词汇研究[D]. 杭州：浙江大学，2001.
- [2] 史光辉. 从语言角度看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的翻译年代[J]. 古汉语研究，2009（3）：44-50.
- [3] 许理和. 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[C]. 顾满林，译// 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. 汉语史研究集刊：第四辑.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1.
- [4] 吕澂.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·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说明[M]. 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0.
- [5] 释僧祐. 出三藏记集[M]. 苏晋仁，萧鍊子，点校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：23.
- [6] 季琴. 三国支谦译经词汇研究[D]. 杭州：浙江大学，2004.
- [7] 方一新，高列过. 旧题安世高译《太子墓魄经》翻译年代考辨——兼论竺法护译《太子墓魄经》的年代问题[J]. 文史，2008（3）：77-99.
- [8] 周睦修（释德安）.《无量寿经》译者考——以佛经语言学为研究主轴[D]. 嘉义：台湾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，2005.
- [9] 季琴. 从词汇的角度看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者及成书年代[J]. 宗教学研究，2006（4）：64-68.
- [10] 季琴. 从词语的角度看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者及成书年代[J]. 中国典籍与文化，2008（1）：19-23.
- [11] 季琴. 从语法角度看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者及成书年代[J]. 语言研究，2009（1）：105-109.
- [12] 陈祥明. 从语言角度看《撰集百缘经》的译者及翻译年代[J]. 语言研究，2009（1）：95-104.
- [13] 方一新. 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——以《大方便佛